

自序

西哲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 C.)嘗言：「人是政治的動物」〔註一〕，人類自聚集羣居以來，即必須營求政治之生活。就往史所見，不論其所營者爲民主政體或爲集權專制，爲共和立憲或爲寡頭政治，不論其社會形態爲初民部落或爲近代社會，人類之政治生活中皆不可避免存有孟子(390-305 B. C.)所謂「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分野，此係由於社會分工之需要所使然，斯亦不足深怪矣。然則，此種分野乃轉出一系列人類史上永恒之問題：如何選拔適當之優秀人才進入政治機構？如何防止當路在勢者受權力之侵蝕而腐化？如何防止官僚機構因形成其自主性而失去其汰腐換新之功能？如何避免統治之少數與被治之多數兩者間僵硬之對立，以致危及全社會整體之安全？凡此諸般問題皆爲人類政治生活中永恒之問題，而爲中外歷史上之大哲及傑出政治家所殫精以思戮力以赴者。

針對上述永恒之問題，柏拉圖(Plato, c. 429-347 B. C.)提出所謂「哲人王」(Philosopher-King)之理想，希望擁有最高哲學智慧之大宗師出而爲人間世之帝王，庶幾哲學與政治合一、智慧與權力不二。〔註二〕吾國先哲所倡尚賢之思想與先秦古史所見之尚賢政治則尤足光耀千古，爲人類文明史上之重大成就。

先秦儒家之尚賢思想力倡成德之賢人出而爲政治之領袖，合德行與政事爲一體，最能體現吾國儒

學成已成物不二、內聖外王不二之精神。墨學之尙賢理論爲吾國古代鼓吹社會流動之不朽文獻。儒墨之尙賢說皆鼓勵「小人」經由進德修業之過程而成爲「君子」，其說實寓有泯滅對立與衝突，將社會融鑄爲不可分割之整體之遠大理想，最足吾人特爲發揚。韓非之學別異道德之賢與才幹之賢，進才幹之賢人而退成德之處士，其尙賢之目的乃爲帝王而設，其學流爲專制之張本亦良有以也。老莊不尙賢之旨則與其遙契於其以「和」爲特質之「道」之概念，成爲千百載以下中國人心靈之避風港。本書之撰寫，旨在就先秦古史所見尙賢政治之理論及其實際二端加以論述，以期彰國史之隱微，發潛德之幽光，或亦可作爲世人反省上述永恒問題之一助緣歟？

本書初稿起草於民國六十一年、六十二年之間，彼時曾獲國家科學委員會之研究費，謹申謝意。初稿寫就，作者隨即負笈異邦，書稿棄之箠笥者數載；今乘工作餘暇，試加董理，付之剞劂，以就正於方家。初稿改訂期間，先後敬承李玄伯先師、蕭公權師、許倬雲師、金祥恆師、朱雲影師審閱一過，提示甚多，在國外求學期間又承杜敬軻 (Jack L. Dul) 師、陳學霖師指導，惠我良多，謹向上述諸師長敬致深切謝意，惟本書中之錯誤或缺點仍係作者個人之責任。先師玄伯先生對本書初稿之撰寫備極關懷，今謹以此書敬獻於先生在天之靈，以誌永恒之悼念。又承以仁叔叔惠題書名，謹致謝意。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一日黃俊傑自序於臺北

注 釋